談呂秀蓮

丹扉
徐佳士

寂靜中的號音

談呂秀蓮的「新女性主義」

徐佳士

這是一個溫和的改革者向一個沉睡中的社會吹奏的一陣號音。在靜寂之中，號音不管怎樣婉轉，也會叫人的心弦顫抖起來。

號手是呂秀蓮，「一個生長在臺灣，接受了二十多年正統中國教育的女孩」。（她的自我介紹，見「自序」。）

呂秀蓮沒有打出婦女解放運動的旗幟，但是「新女性主義」中的音訊則像旗幟一般鮮明。這是她的改革主張的宣言，裏面有申訴，有辯解，有呼籲，有建議，也有抗議。用的語言有時候很尖銳，甚至潑辣，而主張却是溫和的，甚至是妥協的——相當地女性的。

不管怎樣，今天在臺灣，人口二分之一的婦女需要一個發言人，需要一個號手，需要一件宣言。所以，這是一本應該受到重視和歡迎的書。

在今日臺灣地區，經濟建設的大課題幾乎掩蓋了一切其他的問題。婦女問題雖然和一半人口（未必如此有限）有關，但也「不過和一半人口有關」而已，在呂秀蓮以前，似乎從來沒有人認眞地把它當作一個問題來處理。貴婦俱樂部幾乎是一切婦女團體的實質狀態，婦女活動也是止於社交和施慈。婦女領袖們只要自己的地位沒問題，似乎就不

「新女性主義」

知道她們的姐妹們還有任何問題。

可是，婦女問題並不是在有了呂秀蓮之後才發生的。對於許多沒有正當謀生機會或缺乏謀生技術的婦女而言，這個社會一向便是一個僅對她們的皮肉有所需求的市場而已；對於有幸享受到教育權利而獲謀生技術的婦女，職業的門並沒有完全爲她們而洞開，畢業證書在很多情形下，變成了現代形式的嫁妝而已；對於所有的婦女來說，她們是「潑出去的水」，是「瓦」不是「璋」，是「兩個孩子剛剛好」家庭計劃口號中不被計入的孩子。這一類的現狀，在法律意義上造成了人權的損害，經濟意義上形成了人力資源的廢棄，社會意義上，乃是公理的違悖。這麼些年以來，臺灣婦女領袖們似乎沒有看見這些問題，直到桃園呂府一位么妹「踏荒而出」（頁一九五——一九七），這支清末民初女傑們留下的號角才有人拾起而吹奏起來。

所以，像「新女性主義」這樣的著作，不管內容是否十分完美，早就應該問世。它的姍姍遲來，並不表示昨天的臺灣不需要它，而是表示今天這一代的知識女子，不像她們的前輩那樣爲高生活水準所腐蝕，而脫不下高跟鞋了。

× × ×

但是，呂秀蓮的「主義」受到一九六〇年代洶湧澎湃的美國婦女解放運動的影響也是沒有疑問的事。她自己承認，「一九七〇年，美國婦女解[illegible]動緊鑼密鼓之際，此正恭逢其盛」，這位在伊利諾大學讀法律的中國女學生爲了[illegible]次討論會，花了一個星期「潛心搜集、閱讀與整理老美的婦運資料……其中倒也有[illegible]探獲我心的戚戚之言。」（頁二〇〇——二〇一）

不過「老美之言」中有不少東西是被呂秀蓮拋棄掉了：她沒有要求擦去文字裏面男

性沙文主義的痕跡（這種痕跡在中文中似乎遠較英文中爲多），她沒有要求她的同志做出叫內衣商人頭痛的事情，她沒有扯起「解放」（不論是性解放或整個婦女地位的解放）的旗幟，她甚至沒有口號，她承認男女有別，也沒有人聽她用過「婦女權力」（power）這個名詞。她的辣辛辛的語言也許可使人的血液流運加快，但是呂秀蓮畢竟是中國土地的產品，她固守中庸之道，是一位眞正的修正主義者。

假使一定要說呂秀蓮的「新女性主義」是從美國輸入的，則這種輸入品至少要比口香糖、可口可樂、和電視上的肥皂戲等等美國東西、更加符合我們社會的需要。

× × ×

當呂秀蓮在第四和第五章中檢討中國男性中心社會的偏見時，在激昂的情緒下，給人以「高姿勢」的印象。讀者很可能相信，這兒來了一位革命家了。

但當她細數「新女性主義」的主張時，可能是爲了減少阻力，姿勢是很低的。

例如：前一陣子她根據她所引用的學術理論，大力宣揚男女角色並非先天確定而是後天派定的說法，主張不要用「陽剛」「陰柔」的標準來教養兒童（頁一二〇）；但是後一陣子她却提出「是什麼，像什麼」的原則，主張男人應英俊瀟洒，女子要嬌柔嫵媚（頁一三二），男人宜長家中的外交和經濟兩部，太太宜長內政、財政和教育（頁一四五）。再例如：前一陣子她說男女同是構成社會的二大份子，地位平等，好比日月相輝映（頁一〇四），後一陣子談到男女對家庭的責任時，却提出「家庭是女子的三分之二生命，而爲男子的二分之一」的妥協主張（頁一七六）。

假使「新女性主義」已經鼓舞起這一代女性青年要求改變角色的熱望的話，呂秀蓮必須再花費一番唇舌，才能使她們相信她的低姿勢的主張和高姿態理論是並行不悖的。